

南开大学历史系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
《历史研究》编辑部

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 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

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

南开大学历史系等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牛家牌印刷厂印刷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25

字数: 330千 印数: 1—1000

ISBN7-310-00147-8/K·9 定价: 9.00元

目 录

略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代序)	田居俭(1)
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	
讨论会综述	(21)
历史运动的层次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层次	
——再论劳动发展史是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庞卓恒(46)
论历史比较研究中求同与求异的关系	黄敏兰(73)
关于中国封建时代自耕农的若干考察	冯尔康(82)
战国时期手工业者状况	朱凤瀚(108)
中国汉代与法兰克时期劳动者身分变化的若干比较	杨生民(133)
从东汉农村社会看东西方封建社会的差异	刘修明(148)
唐代手工业者生产生活状况探微	田廷柱(167)
宋代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	杨国宜(179)
十五至十七世纪苏松地区农户生产生活状况初探	萧少秋 陈景彪(206)
明清时期景德镇制瓷业中工匠和佣工的生产生活状况	梁森泰(228)
中国古代数学起伏发展的社会原因	项观奇 项观捷(244)
日本封建庄园农民生产生活状况初探	祝乘风(262)
日本江户时代的农民境况	孙义学(275)
法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王渊明(292)

中世纪晚期法国与英国农民土地占有状况	
和经营方式的比较·····	胡晓登(308)
十一至十三世纪英国维兰生产生活状况刍议·····	谢天冰(331)
中世纪英国农村的行政、司法和教区体制	
及其与英国农民的关系	
——兼与封建时代中国农村体制比较·····	徐 浩(348)
意大利城市资本主义萌芽与农村分成制租佃	
的横向关系·····	尚祖琦(374)
关于俄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问题·····	朱 寰 王松亭(386)
中世纪俄国黑色农民的经济状况·····	李景云(400)

略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代序）

田 居 俭

一

收入这本论文集的几组文章，都是选自作者为1985年5月在天津举行的“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提供的研究成果。这次别开生面的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发起的。会议的中心议题暨本论文集的主题是：（一）关于劳动者生产生活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二）关于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

倘若直观地审视这次讨论会的发言和这本论文集的文章，人们或许不假思索就能作出反应：这是一次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具体实践和成果检验。情况也确是如此。在与会者和撰稿者当中，既有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同志，又有从事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同志，既有学识渊博、造诣高深的老年学者，又有勤学善思、著述喜人的中青年后起之秀；借用王羲之《兰亭序》中的话，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尽管诸家研究的课题千差万别，但彼此都怀着切磋学术、取长补短的共同意愿，各自走出了封闭、孤立的“势力范围”，汇集到开放、交融的广阔天地，从封建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况入手，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或就同一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时期进行纵向比较，或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同时期

进行横向比较；或在比较中求同——揭示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或在比较中求异——探索不同国家和地区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一言以蔽之，史家希望通过富有启发的交流，使中外封建社会的研究登堂入室，更上层楼。

然而，我以为，假如把观察事物、研究问题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和停留在这一点上，似乎这次讨论会和这本论文集就无足称道了。因为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事史学研究，并非他们首创。早在明清之际，涉足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就曾对此有过尝试。进入本世纪以后，这种方法开始在欧洲各国盛行。1928年，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M·布洛赫，在《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一文中，首次从理论上对史学的比较研究进行了系统阐述。随后，他又以自己的著作《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性》和《封建社会》，为史学比较研究提供了范例。德国史学家O·施本格和英国史学家A·J·汤因比，在这方面也有建树，他们分别在《西方的没落》和《历史》两部著作中，对人类文明史进行了宏观比较研究。^[1]五十年代以后，这种方法更为法国、日本、苏联等国史学家广泛应用，至今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近年来，它再度引起我国史学界的重视，成为一种习见的研究方法。

那末，这次讨论会和这本论文集，究竟能给我们以什么富有新意的启示呢？当前，我国学术界正处在知识更新、信息畅通、各门学科相互联系彼此渗透的时代，伴随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涌起，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如称为“老三论”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以及称为“新三论”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不可避免地要冲击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学科。一些热衷于此道的同志，正在探索如何将这些方法论引进史学领域，以求史学研究能有所突破。这里，我也想借助系统论的一个原则开阔一下思路，通过这次讨论会和这本论文集，来管窥我国史学研究的前景。

众所周知，系统论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整体不等于部分的总和。”意思是说，整体的性质和功能并非其各个组成部分质与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各个部分处在孤立状态时所不具备的特性与功能，可能优于各个部分质的总和与功能的总和。据此，可否超脱这次讨论会的每个发言和这本论文集的每篇文章，从总体上把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提到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密不可分的方法论高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为宏观的思维来加以认识呢？我看是完全可以的。

为了便于如此说明问题，请允许我先摘引一点与会者的发言：“中外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的比较研究是一次开拓性的尝试”，“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标志着比较历史学的研究在我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因为以往的史学研究，从总体上看，多是把研究对象固定在较高级的层次和较抽象的范畴上（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对更基本的层次和更具体的范畴（如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况）则缺乏深入研究。而研究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况，就能集中地、具体地把历史上特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形式揭示出来，就能从血肉丰满的人类历史活动中科学地求得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尝试“对于把今后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在方法论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2]

我认为，这种估价并非过誉之谈，而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它符合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趋势。

二

恩格斯说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3]在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广义地说，可以追溯到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时代。狭义地讲，也有“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4]。这里，我要强调论述的是“有文

字可考的历史”。因为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更是人们治史必不可少的工具。有了文字，才有可能进行史事记录、史料积累和史书撰写。否则，这一切活动都无从说起。

据说，我国在奴隶制初期就有了记载史事的“图法”。《吕氏春秋·先识》云：夏朝末年，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示图法，涕泪劝谏。“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商朝末年亦然。“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夏朝是否有史官和图法，截至目前尚无实证，故而存疑待考。商朝已有史官和图法，则确凿无疑。从《尚书·多士》得知，周公训诫殷商遗民时曾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此处所谓典册，便是图法。既有典册，必有专司书写、掌管典册之职的史官，商朝称“作册”，最早见于武丁时期的卜辞。此外，甲骨文还称史官为“太史”、“内史”等。这种典册，当是我国史书的雏形；这批史官，则是我国最初的史家；上述典册的制作过程，便是我国治史活动的滥觞。

至周朝，从天子到诸侯，各“国”设置史官已蔚成风气，据《周礼》记载，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不同称谓。这时的典册，记事内容较前丰富，写法也有发展，初步展示了编年史的原始特色。这批史书，大都名之为《春秋》。如《墨子·明鬼》称“周之《春秋》”、“齐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等等。此类为数众多的《春秋》，直到春秋战国之际尚未散佚，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曾说：“吾见百国《春秋》”。^{〔6〕}

在这些御用《春秋》中，不仅记有明君贤臣的“嘉言懿行”，而且记有昏君佞臣的倒行逆施。后世一些有志于创业和守成的君臣，通过披阅《春秋》，引起对前朝治乱兴亡的反思，从而领悟到欲求长治久安，必须以史为鉴的真谛。还在周朝建国之初，摄

政的周公就谆谆教诲年幼的成王，要从夏、商两朝的成败中吸取教训，大声疾呼：“人无于水监（通‘鑑’、‘鉴’）；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6]；“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7]。史书这种监于往事、资于治道的社会功能，助长了君王们对史官的器重。秦朝以前，史官无不爵高禄厚，非但终身任职，而且官位世袭，以备史书撰写连续不辍。汉魏以降，尽管废除了职官世袭制，但史官的尊贵地位依然如故，朝廷不遗余力，网罗“文学侍从之臣”编纂史籍，并从财力物力，文献图籍诸方面予以充分保证，遂把我国造就成具有治史传统的国度。在以往的两千多年里，曾经出现过史家辈出、史著如林、执世界史坛之牛耳的黄金时代。正如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所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8]我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奠基人梁启超也说：“中国在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9]

据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统计，清朝乾隆年间收入是书“史部”的书目（外加因故未收的“存目”），共2,036部，计38,264卷，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纪、时令、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15类。其中出类拔萃者有，编年体的《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的《史记》、《汉书》、《通志》，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典制体的《通典》、《文献通考》，学案体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史评体的《史通》、《文史通义》，等等。

这些体裁多样、卷帙浩繁的史书，其中尽管凝聚着历朝治史者的智慧和才华，蕴藏着他们探求真理的历程和瑰宝，如爱憎分明、秉笔直书的“实录”原则，述往思来，经世致用的资治主张，重人事、非天命的唯物思想，“古往今来，质文递变”^[10]的进化

观点，“物盛则衰，时极而转”^[11]的辩证法则等。然而，从总体上看，严格地讲，它们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因为治史者的思维方式还多是偏重微观考察，而忽略宏观探研，大凡拘于对菁芜混杂的史料反复分拣整理，静止又孤立地从事搜集、辨伪、校勘考订、注释、编纂等系列治史活动，对史料不善于进行辨证地和系统地分析、比较、综合、概括，更谈不上科学地抽象规律。尤为严重的是，这种低层次的研究方式世代相因，萧规曹随，治史者的研究成果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飞跃，很难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升华。即使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如司马迁，虽然含辛茹苦，行万里路，“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12]；读万卷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毕生精力“成一家之言”^[13]，开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他写的那部被誉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14]的巨著《史记》，尽管描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的历史进程，记录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始末和重要历史人物活动，以及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但却无法说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制约作用，更不能透过现象揭露本质与抽象规律，最后治丝益棼，陷入治乱相循的迷宫，无可奈何地叹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15]。

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创始人梁启超，当他和他们隶属的阶级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时候，曾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为理论武器，在猛烈抨击封建制度的同时，对封建史学展开了系统而深刻的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封建时代“历史书法”的弊端是：

……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此固由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其在史部，则《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皆其类也。厥后

《左传》、《史记》等书，常有长篇记载，篇中首尾完具，视昔大进矣。然而以全书论，仍不过百数十篇文章汇成一帙而已。《汉书》以下各史，踵效《史记》；《汉纪》、《通鉴》等踵效《左传》；或以一人为起讫，或以一事为起讫。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纪事本末体稍矫此弊，然亦仅以一事为起讫，事与事之间不生联络；且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16〕

梁启超对封建史学所作的如上评论，言简意赅，切中肯綮。即使用当代人的认识水平来衡量，亦不失为真知灼见。因为事实已雄辩地证明：由于封建时代史家“思想简单”，抽象思维落后，不善于宏观考察，才使封建史学长期停滞在管窥蠡测式的微观研究状态，从而导致汗牛充栋的史学著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不生联络”。

在批判封建史学的基础上，梁启超竭力鼓吹“史界革命”，要把生物进化学说引进史学研究领域，“为史界辟一新天地”。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阐述了这一主张：“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17〕翌年，在《新史学》中更明确指出：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8〕
他在此处所言的“人群”，就是人类社会；“进化之现象”，即为“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象”，“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象”〔19〕；所谓“公理公例”，则是指的规律。假如完整地表述这一论断，便是：史学的使命在于，从人类社会的进化

过程中探求规律。这种认识，无疑是前无古人，为封建时代史家所望尘莫及的。

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设想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20]

继梁启超之后，夏曾佑运用进化史观，在1904年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章节体的《中国古代史》（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这部未完稿的通史著作中，作者专辟一节^[21]叙述中国历史的分期及其立论根据。他认为：“中国之史，可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今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二期：“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因中国之文化，在此期造成。此期之学问，达中国之极端，后人不过实行其诸派中之一分，以各蒙其利害。”“中古之世”又分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此时中国人才极盛，国势极强。凡其兵事，皆同种相战，而别种人则稽颡于阊廷。此由实行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良果者。”“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此时外族侵入，握其政权，而宗教亦大受外教之变化。”“唐时一代，为复盛之期。此期国力之强，略于汉等，而风俗不逮，然已胜于其后矣。”“近古之世”又分二期：“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教殖荒芜，风俗凌替，兵力财力，逐渐摧颓，

渐有不能独立之象。此由附会第二期人之理想，而得其恶果者。“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

梁启超的设想和夏曾佑的实践，尽管并不科学，未能准确无误地揭示出中国古代社会各阶段的主要矛盾与基本特征，更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抽象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但毕竟把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划分为上世、中世、近世（或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并衔接起来考察其从低级向高级渐次进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了。这与扑朔迷离或治乱相循的封建史学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这些著述，从总体上看，还没有彻底跳出封建史家治史的窠臼，许多方面仍与封建史学藕断丝连，难解难分。即使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夏著，如果细绎其内容与形式不难发现，它无非是参照封建时代各类体裁的“正史”、别史，将史料重新分类、重新组合而已。

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败北，在史学领域里摇旗呐喊的人们也迅即偃旗息鼓，仓皇退却。先前鼓吹“史界革命”的梁启超，如今竟将革命的理论武器抛到九霄云外。他在1923年发表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副题为《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中直言不讳“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22]

梁启超在行动上的退却，其源盖出于其思想上的滑坡。此时的梁启超，已不再倡导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是一味鼓吹“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不受“必然因果法则的支配”，甚至竟然申明：“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

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的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23]

这一严酷事实说明：资产阶级史家一旦放弃自己在史学研究中关于历史进化与因果关系的贡献，其思想中闪烁的几星真理火花，便立即为其唯心史观的黑暗所熄灭，其治史活动就必然要重蹈封建史家的旧辙，而局限于搜集片断史实，描述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就思维方式而言，也只能停留在“从具体辗转到具体”的阶段。

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史学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古老的中国史学便增添了旺盛的青春活力，史学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最先在史学领域里传播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1924年问世的《史学要论》，是专门“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怎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著作。在这部开一代史学研究风气之先的著作中，他除了强调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外，特别强调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他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对象的“活的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是社会的变革”，“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24]这种“有生命的历史”是一往直前的，不容人们徘徊审顾。“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

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26]。继之指出，史学研究的任务是：（一）从“不静止而不断的移动的过程”中考察“人事变化的推移”；（二）寻究证据，“以明人事发展进化的真相”；（三）“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26]这三项任务相互衔接，步步深入，最终目的还是“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此处所谓的“普遍理法”，显然是指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而言。进而又指出，史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原则是，“以物质的生产关系为社会构造的基础，决定一切社会构造的上层。故社会的生产方法一有变动，则那个社会的政治、法律、伦理，学艺等等，悉随之变动，以求适应于此新经变动的经济生活。故法律，伦理等，不能决定经济，而经济能决定法律伦理等。”“这样子历史学在科学上得有相当的位置。治史学者，亦得有法则可循。”^[27]

李大钊的这些精辟论断，虽然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却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非常不幸的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未来得及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中国旧史学进行“改作”或“重作”，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光荣捐躯。

继承李大钊未竟之业的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的拓荒之作。这部曾使时人振聋发聩的著作，作者自视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因为他发现恩格斯的这部名著中“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所以他立志补写“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为此，他立足于“社会的整个的建筑是砌成在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的方式生了变更，经济的基础也就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经济的基础发展到一个更新的阶段，整

个的社会也就必然地形成一个更新的关系，更新的组织”^[28]这样的前提，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卜辞彝铭的反复研究，“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勘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29]，缜密方析了秦朝以前中国社会各个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过程，最后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破天荒第一次从扑朔迷离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提纲挈领地抽出一条鲜明清晰的脉络来：“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入了封建时代。”^[30]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是同样适合“中国的国情”的。

后来，尽管随着史料不断丰富和认识的逐步深化，郭沫若对上述结论（主要是奴隶社会的上、下限问题）有所修正，但其基本立论未变。他在榛芜纷拏的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所取得的重大突破，确实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这种筚路蓝缕之劳、大辘轳轮之功，必将永载我国史学发展的典册。然而，郭沫若却非常谦逊，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终篇时申明和呼吁：“这儿所论列的只是一点发凡”，“草径已经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31]

“声应气求”。在郭沫若的倡导下，当时一些有志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家刻苦探研，勤奋笔耕，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写出了一批各领风骚的史学新著。如吕振羽的《史前期的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未完稿），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时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等。其中，《中国通史简编》影响尤大。此书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叙述中国

历史的通史著作，四十多年来，一再重版，累计发行达数百万册之多。

由于这些史学家的共同努力，仅用二十余年的时间，就把我国的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划时代的黄金时期，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格局，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撰写开创了新的章法。建国以来的三十六年，我国的史学研究始终是遵循这条道路向前发展的。各类通史、断代史、专史等著作，几乎都是这种格局和章法的产物。

范文澜在总结写作《中国通史简编》的成败得失时曾提出，要写出完好的通史，必须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这“三通”思想，我以为可以看作是从方法论上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征的简要概括。为了完整地转述作者原意，特将有关部分全文摘录于下：

所谓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列宁说过，几千年来，毫无例外，在一切国家中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显示出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正确性和连续性，就是，最初是没有阶级的初期氏族社会，原始社会。其次是建筑在奴隶制度上的社会。在绝大多数的国家中，奴隶制度都发展成为封建制度。继封建社会而起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列宁称这些发展阶段为“基本的事情”和“基本范围”。研究中国历史，不能描绘出这个范围，就无法掌握贯穿古今的一条基本线索。所谓旁通，就是社会生活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列宁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搜集了片断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研究的途径，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